

第五章

構建穩定秩序：

中國共產黨如何維護大學校園的政治安定？

縱觀古今中外，從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市的餐桌靜坐運動，¹到二十一世紀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青年學生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群體，總是在歷史的重要拐點上，顯示出影響重要社會及政治軌跡的力量和意願。當學生運動興起，權力的既有結構往往受到威脅；當學生對官方意識形態及國家政策保持冷感而與國家主體政治秩序保持距離時，國家的社會支持基礎會出現缺陷和短板。²在西方，青年大學生因此被學者認為

1 發生於1960年2月1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市的餐桌抗議事件（Greensboro Sit-Ins）是二十世紀中期非裔美國人抗議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標誌性事件。坐落於格林斯伯勒市中心的伍爾沃思百貨（the Woolworth's）是當地著名的商店，其一樓西北角設置快餐館。然而，該快餐館的座位按膚色劃分：白人可以任意就座，有色人種則只可坐於隔離區域。1960年2月1日下午4時30分許，四位來自北卡羅萊納農業與科技學院（North Carolina Agricultural and Technical College）的黑人學生來到快餐館。按事先策劃，他們並沒有坐到有色人種指定區，相反在吧台前落座並要求服務，當即遭到服務人員拒絕。快餐館經理並決定報警，當地媒體記者迅速報導了事件。學生們決定擴大抗議規模。次日清晨，29名學生在快餐館吧台前就坐，一言不發複習功課。至2月3日，該餐館的座位幾乎全被學生佔滿。抗議活動在當地民權組織的動員下不斷擴大，到2月6日已經有上百名學生走上街頭抗議伍爾沃思百貨商店的種族隔離政策。儘管在當地政府官員和社會知名人士的調停下，抗議活動在7日宣告暫停，但由於當地的百貨公司不同意完全撤銷隔離就座政策，學生和社會團體於4月初再次走上街頭並佔領快餐館。最終，迫於銷售額大幅下滑的壓力，幾家百貨公司達成一致意見，取消了極具歧視性的種族隔離就座政策。參見：William Henry Chafe, *Civilities and Civil Rights: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and the Black Struggle for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iles Wolff, *Lunch at the Five and Ten: The Greensboro Sit-ins* (New York: Stein and Day Publishers, 1970).

2 Seymour M. Lipset, *Rebellion in the Un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p.4.

是「國家理想主義的儲藏庫」³，而大學校園也被稱為「民主運動波譎雲詭的中心舞台」⁴。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大學生也一直都是國家政治生活中最具有活力的力量。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學生運動始終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國家歷程中的重要篇章。在中國現代國家治理中，要保持國家基本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就必須保證大學生群體對國家政治價值和政權結構的支持，以及大學校園的安定。令西方世界感到驚奇的是，當過去十年由中亞到中東的政治亂局不斷傾覆有關各國政權、香港地區和台灣地區的反體制學生運動也甚囂塵上時，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學校園始終成功保持政治安定，大學生群體對國家政治價值的支持也極為鞏固。事實上，自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國內地就再沒發生過大型的反體制學生運動。即便當學生在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位於貝爾格萊德的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抗議日本政府釣魚島政策等不同時間節點走上街頭時，他們所針對的對象也是美日和西方反華勢力，他們支持的

3 Francis Donahue, "Students in Latin-American Politics," in Alexander DeConde (ed.), *Student Activism: Town and Gow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71), p.254.

4 Robert A. Rhoads, *Freedom's Web: Student Activism in an Age of Cultural Diversity*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

是中國政府的立場。⁵這不禁讓人感到好奇，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極為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保持全國 2,300 餘所高等院校的政治穩定，並得到大學生群體在政治上總體的認同和支持？⁶

政權與管控

在現代政治制度背景下，國家管控是任何政權正常運行的關鍵所在。政治權力，尤其是主權國家，或多或少必須依賴其對國家暴力機器的壟斷來作為建立社會管控的根本保證和最後手段。這一點從東到西，對於不同國家都適用。沒有防暴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強制手段，任何國家政權都無法運行。⁷事實上，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直接將現代國家稱為「具有強制能力的組織機器」⁸。

5 例如，相關論述可見於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和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資料，2010 年中國有 2,358 所正式高等教育機構，在讀學生 22,317,929 人。可參見謝煥忠編纂：《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23 頁。

7 Max Weber, "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 in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eds.),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 p.1.

然而，沒有任何一個政權能夠僅僅依靠國家暴力〔或者用意大利共產黨人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直接支配」〕來確保政權對於社會的管控。不少人認為，國家直接使用暴力的成本甚高，並且使用暴力也會影響執政力量的認受性基礎。因此，為了有效地實現對社會的管控，政治權力永遠都需要透過制度化手段及「日常實踐」⁹來維持「明確而精細的對內管控」，從而保證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和安全。¹⁰這類日常實踐通常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其一為意識形態，其二為組織機器。

葛蘭西在其遺著《獄中筆記》中主張，西方工業化國家的資產階級往往利用由自己或代理人掌握的「文化霸權」來支配被剝削的社會階層，並將其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念內化於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之中。統治階級通過操縱文化——具體而言就是多元社會中的信仰、價值觀、話語、意義構建等，將他們本階級的文化準則固化為全社會的普遍觀念，並將它強加於民眾，從而有效地確保大部分群眾的自發贊同。在那種情況下，國家的強制機器只需要對「那些積極或消極拒絕給予『贊同』的社會群體」執

9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0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172.

行紀律就已足夠維持基本統治秩序的安全。¹¹

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圖賽（Louis Althusser）則認為國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秩序的持續穩定，需要社會成員「對既定秩序的規矩抱有服從態度」，而這種態度是「以意識形態服從的形式來體現」。¹² 因此阿爾圖賽對「國家暴力機器」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作出區分，並且認為政權若不能夠在「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內及之上保有優勢地位，國家權力將無法存續。¹³ 阿爾圖賽認為，教育機構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需要確保民眾服膺於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或其實踐。¹⁴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也認為，意識形態（或作「霸權論述」）因此構成了國家權力得以對社會進行有效管控的支配性力量和權威基礎。¹⁵

如前所述，國家權力對社會進行管控、從而保證國家基本政治社會秩序穩定的第二個渠道是國家組織機器。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 Punish*）一書中，曾對現代化條件下權力對於個體進行管控的方式進行了詳細

研究。福柯認為對於現代的整體化權力而言，管控是透過行使規訓式權力而得以建立的。透過以有組織的形式推行特定習慣、規則和秩序，規訓式權力將所期望的規範及行為內化於權力行使對象的日常生活之中。¹⁶ 根據布萊恩·特納（Bryan S. Turner）的解釋，現代權力乃是通過一種持續的「制度性規則及精細規訓控制組成的網絡」¹⁷ 來得以實現。根據特納的觀點，「隨著在科層化及理性化過程的展開，群眾對於理性規訓的服膺會日益增加」¹⁸。

因此，在現代政體中，國家對社會的管控已經逐步演變成一種綜合強制力量、表意力量以及規訓力量三者的複雜過程。今天，世界各地的政權也愈來愈需要一整套巧妙（nuanced）、常態化（normalized）並經內化（internalized）的系統及策略，以確保國家通過組織機器和意識形態這兩個基本渠道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掌控。

研究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大學生群體的學者們一直強調中國大學校園裡的權力結構和制度安排對於學生的政治活躍度和傾向性具有關鍵的影響力；校園權力結構也對學生運動的發生和

¹¹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12.

¹² Louis Althusser,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pp.6-7.

¹³ 同上，第 20-21 頁。

¹⁴ 同上，第 7 頁。

¹⁵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2007), p.xxiii, 45.

¹⁶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170.

¹⁷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 Society* (Los Angeles: Sage, 2008), p.95.

¹⁸ 同上。

形態具有影響。¹⁹舉例來說，在1975至1976年，安·肯特（Ann Kent）在對上海師範大學的研究中，檢視了毛澤東時期如何努力通過教育改革、階級劃分及開門辦學等途徑，來改造高等教育制度、建設培養又紅又專人才的新型社會主義大學。²⁰另一方面，安舟（Joel Andreas）關於清華大學工宣隊活動的研究，揭示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國家依然得以通過一套以相互牽制和派系間的制度化「制衡」為特點的大學管治模式來保持其對大學校園的管控。²¹徐美德（Ruth Hayhoe）通過調查於中國高等院校開設的思想政治課程，發現以「德育」為名的意識形態教育，

19 舉例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相應論述可見於 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及 Jeffrey Wasserstrom and Xinyong Liu, "Student Protest and Student Life: Shanghai, 1919-49," (1989) *Social History* 14(1), 1-29；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相應論述可見於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天安門運動的相應論述可見於 Douglas J. Guthrie, "Political Theater and Student Organizations in the 1989 Chinese Movement: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iananmen," (1995) *Sociological Forum* 10(3), 419-454。此外，Craig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Jeffrey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以及 Dingxing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也有相關論述。

20 Ann Kent, "Red and Expert: Th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at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1975-76," (1981) *The China Quarterly* 86, 304-321.

21 Joel Andreas, "Institutionalized Rebellion: Gover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2006) *The China Journal* 55, 1-28.

有效促進了國家維護大學生群體的總體政治穩定。²²大衛·瑪爾（David Marr）和駱思典（Stanley Rosen）則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與越南的青年政策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們的研究展示了中越兩個政府是如何運用精巧的組織架構，以及透過有系統、有選擇地向青年人分配資源，以「促使青年人站在政權一邊」²³。

儘管這些西方學者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鮮的視角，但他們的研究要麼只著重特殊的歷史階段（比如文化大革命最為明顯），要麼只強調國家對大學校園管控中的某一方面，在理論和實證上均存在一定局限。迄今為止，對於中國黨和政府對大學生群體和大學校園的管理體制，及該機制的運行實踐，均未有總體性的實證研究。本章正是旨在為這一系列尚未解決的問題提供初步的答案，例如：與過去大規模群眾運動年代相比，二十一世紀中國大學校園內逐步常態化的權力架構和管控機制有哪些延續和改變？國家如何管理和教育大學生群體並保持大學生群體的政治態度與國家政權的一致性？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校園外各類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凸顯，國家如何將大學生群體與這些社會矛盾

22 Ruth Hayhoe,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Ruth Hayhoe (ed.),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pp.211-238; Ruth Hayhoe, "Political Tex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before and after Tiananmen," (1993) *Pacific Affairs* 66(1), 21-43.

23 David Marr and Stanley Ros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Youth in the 1990s," (1998) *The China Journal* 40, 145-172.

隔離開來，從而保障大學校園的安寧有序？

組織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建立後，在新政權百廢待興之時，建立及維持對大學校園的有效管控被視為黨對中國城市「上層建築」重要組成部分的接管，具有標誌性意義。隨著五十年代初期在人民政權主導下新中國高等教育版圖的大型重組，中國共產黨在大學校園裡公開設置各級黨團組織，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延伸至每間教室。新中國政權對於大學校園和大學生群體的影響建基於三項主要工作，即：建立中國共產黨在大學校園的領導地位、學術權威和政治權威並重，以及開展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課程改革。經過改革的新的高等教育內容則強調高度一致的意識形態、重視技術實用型知識，並對高等教育的发展與國家中長期工農業發展計劃之間作出協調。²⁴ 在隨即到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大學校園完全被無休止的群眾革命運動所吞噬，正常

24 在 Andrew Walder 的著作 *Fractured Rebell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 1-27 頁中有著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大學學生組織架構的有趣記載。相關論述還見於：Theodore Hsi-En Chen,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in Communist China," (1951)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77, 135-145; Immanuel C.Y. Hsu, "The Reorga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49-61," (1964) *The China Quarterly* 19, 128-160; Ronald F. Price,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970).

的教學、科研秩序蕩然無存。但大學生群體與國家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卻通過這些群眾運動實現了高度共融。可以說，青年學生群體成為了文化大革命早期階段的主要動員力量。

在改革開放時代，國家否定過往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進行政治動員、開展「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做法，努力恢復各行各業的正常秩序，自然也包括重建大學校園裡正常、穩定和安全的政治及教育秩序。改革開放後逐漸恢復常態的大學生管理系統包括三重科層結構，即校園內共產黨系統、共青團系統以及學生工作系統。²⁵ 這三套同時並行又互相交融合作的科層體系不僅有助於國家由上而下地監察大學校園和大學生群體，也有利於政治上合格可靠的學生積極分子以及學生組織幹部得以由下而上地參加校園政治生活和日常管理。有別於大學校園裡頗具散漫性的學術權威（由校長、院長到各級學術委員會和教授組成），由三重科層體系組成的學生管理體制則顯得高度集中，指揮快捷靈敏，令行禁止，並直接向校黨委書記負責。而且，在學生管理體制中，雖然從學生積極分子中甄選的學生幹部也會協助一些工作，但主要的領導、決策和指揮崗位均由黨團幹部恆常擔任；因此，每個高等院校內部的學生管理架構又得以超越大學範

25 在 1989 年之後，大部分中國大學的黨委都成立了與原有的組織部、宣傳部和統戰部同級的學工部。在方慧建的著作《清華工作五十年》（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中可見關於清華大學學工部建立過程的有趣記載。

圍，成為由當地黨委或是省級高教工委主導的、範圍更大的青年學生管控架構的一部分。圖 5-1 展示了在一所典型的省立大學中學生管理體制的組織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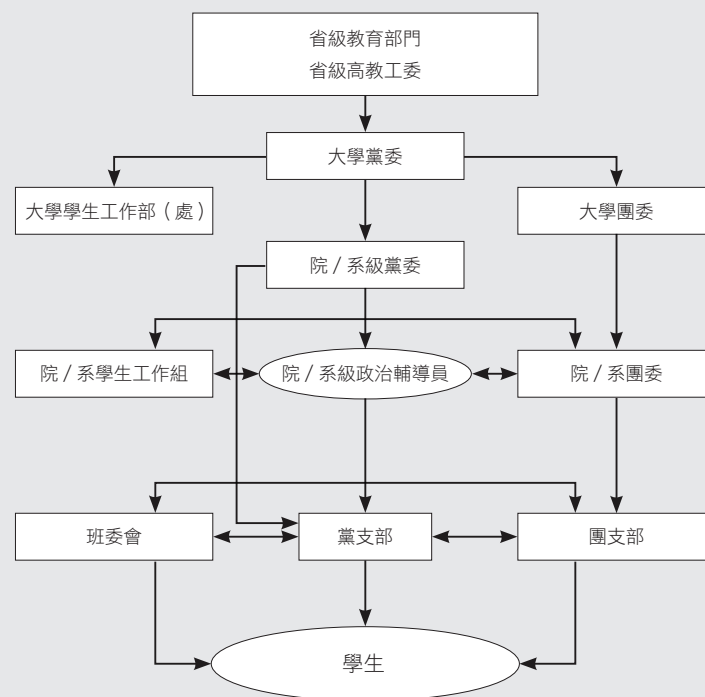
中國大學校園內負責學生管理的科層體制，注重國家如何通過制度化途徑有效進入最基層的學生群體。因此，在這個架構中最重要和最基礎的支柱就是在文革後重新恢復起來、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進一步規範化的政治輔導員 / 班主任制度。2006 年 7 月 2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以第 24 號部長令頒佈《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明確要求所有大專院校的班級都必須設置政治輔導員。這份文件規定：

輔導員是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和管理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教師和幹部的雙重身分。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幹力量，是高校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輔導員應當努力成為學生的人生導師和健康成長的知心朋友。²⁶

該文件第六條明確規定：

高等學校總體上要按師生比不低於 1：200 的比例設置本、

圖 5-1：中部某省立大學學生管理體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於中部某省立大學進行的田野調查研究。

²⁶ 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2006 年。

專科生一線專職輔導員崗位。輔導員的配備應專職為主、專兼結合，每個院（系）的每個年級應當設專職輔導員。每個班級都要配備一名兼職班主任。²⁷

在一些大學，學生管理系統規定政治輔導員要固定居住在學生宿舍樓，保持跟大學生全天候的接觸。透過保持與學生的日常教育、監督、聯繫和管理，這些基層的幹部教師組成了大學生管理機制的骨幹力量。一位學生工作幹部在接受訪談時這樣描述：

問：輔導員制度是怎樣的？

答：每個學校其實都差不多。這幾年裡，學生出問題的情況比以前更多了，國家層面也對這一塊工作更重視。現在要求大學生不光學習要好，腦子也要「健康」，心理、心態都要好。所以……輔導員工作內容比較實在。雖然物質待遇不算特別高，但也是事業編制；政治待遇是很高的……現在對輔導員還有專家化的培養計劃：比如心理諮詢、網絡建設，等等。以前覺得輔導員只是跟學生聊聊天而已，現在有意識地進行專家化培養，給輔導員提供很多平台，進行各種培訓。

問：輔導員和同學們有哪些交流渠道？

²⁷ 同上，第六條。

答：有些輔導員是住學生宿舍的，相當於 24 小時可以見到學生。只要是我們這條戰線上的人（指學生工作部門），學校都要求我們每個禮拜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手機開機，理論上學生隨時可以聯繫到我們。也有通過 QQ、MSN、BBS（校園電子佈告板）等平台與學生聯絡，還會通過座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彙報通報等。²⁸

教育部規定，大學政治輔導員要承擔以下的工作職責：

（一）幫助高校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理想和堅定信念。積極引導學生不斷追求更高的目標，使他們中的先進分子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二）幫助高校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經常性地開展談心活動，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心理品質和自尊、自愛、自律、自強的優良品格，增強學生克服困難、經受考驗、承受挫折的能力，有針對性地幫助學生處理好學習成才、擇業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體問題，提高思想認識和精神境界；

（三）瞭解和掌握高校學生思想政治狀況，針對學生關心的

²⁸ 對某國立重點大學學生工作幹部的訪談，2011 年 6 月。

熱點、焦點問題，及時進行教育和引導，化解矛盾衝突，參與處理有關突發事件，維護好校園安全和穩定；

（四）落實好對經濟困難學生資助的有關工作，組織好高校學生勤工助學，積極幫助經濟困難學生完成學業；

（五）積極開展就業指導和服務工作，為學生提供高效優質的就業指導和信息服務，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念；

（六）以班級為基礎，以學生為主體，發揮學生班集體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組織力量；

（七）組織、協調班主任、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和組織員等工作骨幹共同做好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學生中間開展形式多樣的教育活動；

（八）指導學生黨支部和班委會建設，做好學生骨幹培養工作，激發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²⁹

除輔導員制度之外，中國大學校園在組織結構上的另一個特點是大學生現今仍會被編成一個類似部隊般的逐級架構，單個學生被編入一個由最基層的班級、年級、專業、學院，一直延至大學層面整個學生群體的統一組織體系。由每個班、專業、學院中的所有學生黨員所組成的學生黨支部，則是學生生活中權力最大的自我管理機構。代表著執政黨權威的學生黨支部，處於學

²⁹ 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第五條。

生生活的中心位置；在上級黨委 / 總支部領導下，學生黨支部負責在大學生群體中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及吸收新黨員、對普通學生的表現進行政治鑒定、組織重要學生活動、為各級學生幹部的候選人推薦人選、負責審讀和跟進黨積極分子的書面或口頭「思想彙報」，並且就涉及本單位學生群體利益的事項（如評先、評獎等）進行決策。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學生管控機制，是教育、監督、引導和自我管理四位一體的體系，成為新時期國家對多元化社會進行治理的龐大機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³⁰

校園管控

從毛澤東時代繼承下來的集中統一的組織架構是整個學生管理系統的基礎部分；在新的形勢下，國家如何策略性地通過校園組織架構開展針對大學生群體的工作則是更為複雜的問題。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崇尚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模式——即動員和鼓勵受教育的年輕人參加甚至在某一階段主導由國家發動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來實現學生和政權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取態方面的一致和共融。隨著文革的終結和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改革開放時期的大學校園管控機制變得更為「去運動」化、科層化以及務實化。融入到校園日常學習

³⁰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生活中的精細化管理及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過往以意識形態灌輸和政治動員為主導的管控模式，「寓管理於服務中」成為大學黨政系統行使管理職能的主要哲學。與此同時，普通的黨政幹部或教師取代了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積極分子和進入校園的「支左」軍人幹部，成為學生管理隊伍的主要力量；他們以不同手段和渠道實現對大學生群體的管控，確保大學校園正常的政治和生活秩序。

意識形態教育及政治管理

在改革開放時代，隨著社會上由大規模群眾運動而來的高漲政治熱忱逐漸退散，中國共產黨最傳統的意識形態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課程，重新作為國家對高等教育的重要要求進入校園，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1989年天安門政治風波後，黨對八十年代的思想教育工作進行了反思；中央領導集體認為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革命歷史方面教育和訓練的嚴重薄弱是導致大學生思想混亂、最終釀成政治動亂的主要成因之一。³¹1991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致信教育部，要求加強關於中國革命歷史的教育，並將之編入由小學到

31 李鐵映：《高等教育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載國家教委政策法規司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教育文獻選編》，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395頁。

大學的整個教育課程中。³²自此，中國政府就致力於在國家高等教育中重建完整的意識形態教育課程體系。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起，教育部規定，中國修讀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學生在學習期間須完成315個學時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修讀理科和工科的大學生則須完成210個學時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³³199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教育部聯合頒佈了一項文件，要求二十一世紀的所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必須「以鄧小平理論為中心內容，比較系統地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³⁴。因而，在全國範圍內，一個包括政治教育和道德修養課程的「兩課」系統在各高等院校迅速建立起來，並訓練和配備了相應的師資力量。³⁵這一特別的政治教育課程體系包括了必修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革命史、思想品德和法律基礎，以及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的主要執政理論。

32 江澤民：《致李鐵映、何東昌的信》，同上，第479-480頁。

33 廈門大學檔案館校史研究室：《廈門大學校史》第二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4 龔海泉、張晉峰、張耀燦：《二十世紀的中國高等教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頁。

35 舉例而言，以某省立綜合性大學為例，「兩課」包含一系列政治教育課程，包括：（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2）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4）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這些必修課程分散在連續四個學期中，學生需要在這些課程中達到及格成績才能畢業。課程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育，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中國革命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以及法律基礎知識教育等。不同高等院校為開設「兩課」專門設置了公共課教學部或者由馬克思主義學院來承擔相關教學任務。「兩課」的教學形式通常以每週課堂授課、討論班、講座及實地考察活動的形式展開，內容較為豐富多樣。

在以正式必修課形式進行的意識形態教育之外，高等院校也定期開展結合時事政治、內容形式豐富多樣的思想教育活動。在筆者調查的某省立大學，這些融入大學生日常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形式不拘，包括（但不限於）班會、團員會議、讀書會、時事研討會、知識競賽、文藝活動以及黨員會等不同形式。而且，每所高等院校均設有學生黨校，這些黨校是對學生中的優秀和積極分子進行常規思想政治教育和黨性養成的中心。中央層面也會定期在全國或全黨範圍內開展不同主題的政治教育活動——如「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週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兩學一做」（註：指「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等學習教育活動。這類活動在大學校園裡的相應展開也成為對大學生群體特別是學生黨員群體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組成部分。

當校園之外有突發政治事件時，學校也會組織臨時和有針對性的政治學習，一則為了穩定學生情緒，二則在危機期間以此限制學生的行動力。例如，2011年春季，當有海外網站呼籲中國青年發動一場「茉莉花革命」的時候，筆者所調查的某省立大學就緊急召集學生按班級為單位進行特別政治學習，以令學生不受境外、國外敵對勢力影響。³⁶ 有時加強版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會

³⁶ 對大學學生的訪談，2011年10月。在關成華的《北京大學校園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也有相關論述。

以愛國主義儀式等方式進行，如升旗儀式、宣誓儀式、紀念活動等等。

這些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經濟和社會轉型大背景下對於國家來說具有必要性。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要應對的，首先就是年輕一代大學生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和對外開放條件下西方思潮衝擊所引致的對原有社會主義政治和道德原則的疏離。譬如，一項在2003年進行的大學生問卷調查顯示，76%的受訪大學生表示基本或是完全不同意「集體主義原則」。相應地，加強對集體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等社會主義原則的教育和灌輸，鞏固國家正統意識形態對於大學生群體的影響，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顯得極為重要。³⁷

在有關敘利亞政治的研究中，麗莎·威登（Lisa Weeden）研究了「在信仰或是情感承諾缺位之時，修辭和象徵對產生政治權力的作用」。威登認為儀式和意識形態的公開展示，構成了「一種基於順從的支配策略」。³⁸ 威登將此類支配標籤為「規訓性—象徵性權力」。³⁹ 說到底，正如齊澤克所言，「真正的服從只有一種……就是『外部』的服從：由堅定信仰產生的服從已經不是真正的服從，因為它早已透過我們的主體性作為中介」⁴⁰。

³⁷ 萬斌、張應杭：《高校政治思想教育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³⁸ Lisa Weed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5.

³⁹ 同上，第145-152頁。

⁴⁰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p.35.